

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 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

洪 郁 如^{**}

摘 要

本論文旨在分析 1930 年代末到 1945 年有關台灣女性的服裝論述，藉此來探討殖民地情境下戰爭在性別問題上呈現之意義。隨著戰局逐漸緊張，被迫徵召送至戰場的男性也日益增多，如同日本國內一般，如何有效加強後方的統制，特別是女性的動員，成為台灣總督府的當務之急。事實上，殖民當局對台灣女性服裝的關注可溯及治台初期，在戰爭時期又被重新討論。同時期的日本國內，所謂「國民服」的制定等等，如何改革女性服裝以符合戰時所需成為熱門話題，亦引發各種爭論。相對於日本國內，殖民地社會由於是以多數台灣人為對象，服裝問題更是呈現複雜之面貌。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從性別看現代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感謝評論人定宜庄教授以及與會來賓熱心指正，並感謝兩位審查人對本文所提寶貴建議。撰寫過程中，承蒙黃美娥教授、游鑑明教授在相關文獻資料上指點甚多，在此一併致謝。

**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准教授

本文認為，1930年代後半開始，因時因地不同在台灣女性身上交替出現的旗袍、洋裝、モンペ等，必須從殖民地政治與流行文化兩個層面來進行解讀。身穿旗袍不一定意味著女性的「抗日」，著用和服也不盡然就表示女性的「親日」。作為女性自我表現方式，席捲世界各地之摩登文化即使進入戰爭時期餘韻猶存。在戰爭的大義名份下，殖民地政治暴力，試圖介入女性的服裝穿著，而女性也不斷摸索著如何在戰時堅持自我。

關鍵詞：日本殖民統治、服裝、旗袍、和服、モンペ、戰爭

一、前 言

本論文旨在分析 1930 年代末到 1945 年有關台灣女性的服裝問題，藉此來探討殖民地情境下戰爭在性別問題上呈現之意義。討論近代台灣戰爭經驗，也就是對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期間進行檢討時，殖民主義¹是必須同時考量的變數。對日本帝國而言，這場戰爭無法單憑日本本土資源而持續，殖民地的人力與物力都必須進行動員。所謂總力戰，是指為了進行戰爭而動員國內包括從政治到經濟的所有一切。而進行殖民地人力動員的首要之務即為人心動員。人心動員在於塑造對殖民母國

1 殖民主義(colonialism)，一般係指為獲取或維持殖民地之政策，和予以合理化的思想意識型態。參閱：《日本大百科全書》（東京：小學館，1984-1994）。水野直樹認為，殖民主義具有兩重性格，歐美殖民主義以文明化與差異化（野蠻化）為特徵，而日本型殖民主義的兩重性格則表現在「同化」與「排除」。具體而言，日本的「同化」政策不單具有歐美有以「普遍」文明為基準的「文明化」面向，更強調將「日本化」深植於被支配者，或把這樣的「同化」和「文明化」畫上等號。但即使被支配者同化於日本，依然拒絕賦予其同等地位與權利。參閱：水野直樹編，《生活の中の殖民主義》（京都：人文書院，2004），頁 8-9。筆者認為，殖民主義的合理化基礎，雖建構於殖民者對被殖民者主張的優越性，但在所謂日本型殖民主義中，以「日本化」為重要內涵的「同化」政策與「文明化」二者之間，自殖民統治之初即存在著根本矛盾，此一矛盾進入戰爭時期逐漸露呈。殖民者硬在「同化」和「文明化」之間加上的等號，不斷受到威脅與挑戰。

之忠誠心，自發地參加戰爭，進一步說就是皇民化。² 隨著戰局逐漸緊張，被迫徵召送至戰場的男性也日益增多，如何有效加強後方的統制，特別是女性的動員，成為台灣總督府的當務之急。

在戰爭時期的日本國內，如何改革女性服裝以符合戰時後方所需成為熱門話題，在制定所謂男性「國民服」的延長線上，女性「標準服」的制定亦引發各種爭論。相對於日本國內，殖民地社會由於是以多數台灣人為對象，服裝問題更是呈現複雜之面貌。1930年代後半開始到戰爭末期，依時地不同，洋裝、旗袍、和服或是モンペ³ 都可見台灣女性穿著。對於戰爭與服裝的關係現象，目前相關論文著作多以服裝史角度進行分析，關切焦點也傾向於服裝本身的種類、樣式設計、質地、活動性等要素。相關研究以政治因素為服裝變化主因，雖也意識到流行要素，對兩者相關性的論述並不多。⁴ 另外，在過去以戰爭體制為主題的研究中，對服裝扮演的角色關照有限，多僅論及モンペ，或與標準服相混淆，或承襲當時論述未做進一步檢討，以為モンペ比台灣傳統服裝更便於活動。⁵ 至於旗袍、和服或是傳統台灣服等其他服裝在戰爭時期扮演之角色與變化，其內在意義一直是被忽視的。

戰爭體制下的服裝管制，通常包含精神動員、勞動力動員、資源節

-
- 2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2007），頁4、141。
 - 3 モンペ（燈籠褲）是日本農村婦女勞動時穿著的長褲，較常見於東北一帶，樣式類似現代的燈籠褲。剪裁上的特徵為腰部寬鬆，因此和服上衣可塞入褲頭，褲腳呈緊縮狀，利於活動。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政府獎勵女性穿著モンペ與贊否兩論的內容，以下本文將有進一步說明。
 - 4 蘇旭琄，〈台灣閩族婦女傳統服裝的設計與變化——AD1860-1945〉（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夏士敏，〈近代台灣婦女日常服裝演變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葉立誠，《台灣服裝史》（台北：商鼎文化出版，2001）。葉立誠研究中對日治時期服裝演變與殖民統治關係有詳細論說，但基本上以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為分析主軸，對來自日本本土的影響、戰爭時期當局服裝方針的內在矛盾，與穿著者本身意識主張之間的複雜性並無著墨。
 - 5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北：日創社文化，2006），頁144、157。楊雅慧，《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34。

約的三種意義。本文首先關切的問題是，在包含多數異民族女性的殖民地大後方進行人心動員，服裝的這三種意義如何被解釋與操作。具體將檢討日本對女性服裝問題的處理方式，在殖民地產生的矛盾、變化和調整，並藉此理解日本治台長久以來存在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在遭遇戰爭體制帶來追求效率化的迫切需求之際所可能產生的糾葛。其次，服裝習慣同時具有社會性與個人性。殖民地政治如何介入女性服裝行為，以達舉國一致參與戰爭？服裝流行文化有其自律性，戰時體制下的殖民地女性又如何能在服裝上回應，也是本文關切的另一個問題。

二、「摩登」與「去中國化」之間的旗袍⁶ 圖像

（一）皇民化運動下的旗袍

戰爭是使服裝問題浮現殖民地政治檯面的關鍵因素。在進入戰爭與服裝的討論之前，我們需要對日本統治台灣以來台灣女性的服裝狀況先做初步了解。清治以來台灣女性以兩件式衣褲或衣裙為傳統穿著，上著短衣，下著褲，在正式場合或盛裝之際也有上著長衣，下加裙的穿著。由於台灣漢族社會由移民所構成，基本上沿襲了原鄉穿著。1920年代以後，兩件式的衣裙或衣褲穿著也受歐美服飾影響而產生變化，特徵在於衣短袖寬，裙長且呈前圓後圓，剪裁較為貼身。但進入1930年代後，新式衣裙也開始衰微，經歷解纏足運動，或是根本無纏足經驗一代的女孩，特別是接受現代學校教育的女孩們，開始接受以洋裝為制服的全新服裝經驗。她們在學校穿著西式制服，居家也多為洋裝。⁷

6 台灣閩南話所謂的「長衫」，即指旗袍，現代日文為チャイナドレス(Chinese dress)，英文為(Qipao; a cheongsam; a close-fitting Chinese dress with side vents)。這些語彙指涉意涵微妙不同。長衫單純意味著長衣，旗袍則多標明原為旗人服飾，日英文則為中國服之意。本論文為了現代中文讀者閱讀之便而使用「旗袍」一詞，唯引用部分保持原文「長衫」。日治時期台人以「長衫」稱之，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也使用「長衫」一詞。在筆者訪談經驗中，或許因為戰後台灣政治經驗或兩岸關係影響，有些長輩對於用現代日文チャイナドレス或是中文「旗袍」稱呼「長衫」感到不悅，在此特別附記之。

7 洪郁如，〈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ファッションと権力〉，《接続》，期4(2004年)，

1930年代的服裝概況大致如下：年長女性多著衣褲或衣裙型式的傳統「本島服」，其中一部分富裕家庭女性也開始穿旗袍，至於年輕世代則以洋裝居多。當然這也存在城鄉與貧富之間的差距。居住鄉村或是經濟困難家庭的年輕女性，依然穿著傳統「本島服」，同樣是「本島服」，衣料自然也因貧富而有所差異。但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逐漸轉型為洋裝的時代。

受到日本國內影響，戰時台灣服裝改良的必要性與方法也受到注目。中日戰爭後所展開的皇民化運動中，服裝經常列入改革議題。對於台灣女性服裝，在標準服出現之前，皇民化運動中呈現日本化與去中國化兩個重要方向，⁸ 具體實踐上一方面是積極提倡和服，另一方面則對旗袍加以排除否定。

在「去中國化」的部分，旗袍經常首當其衝。然而旗袍並非台灣女性傳統服飾，而是1930年代台人年輕女性的時代新寵，受到中國大陸女裝流行趨勢影響，旗袍開始為一部份中上階層台灣女性們所喜好。新式旗袍被習慣穿著洋裝的一代所接受，反映出了近代女性服裝審美觀的變化。新式旗袍強調女性身體曲線，這個以當時上海為中心的摩登女性象徵，與前世代直線寬鬆式傳統旗袍不同。不只是中國與台灣，1932-1933年左右，旗袍也在日本都會摩登女性之間大為流行，百貨公司出現了身著旗袍的女店員，⁹ 1935年大日本啤酒（日文為大日本麦酒，即今日的SAPPORO啤酒）也針對中國市場印製穿著旗袍的摩登女郎之海報。¹⁰ 可

頁2-9。高本莉，《台灣早期服飾圖錄》（台北：南天書局，1995），頁40。

8 本論文所使用「日本化」與「去中國化」二詞，以往研究如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頁17-18，則以「強化日本的色彩」和「消弭中國的因素」描述之。皇民化運動「去中國化」在於一掃文化、宗教、社會生活等領域之中國色彩，如禁止漢文課、漢文欄，歌仔戲、布袋戲等傳統戲劇，北管南管等傳統音樂，「正廳改善運動」「寺廟整理運動」等等。然而，對象事物是否包含中國因素，換言之，到底是「支那色彩」或是「本島色彩」則完全基於殖民者主觀判斷，這與台人本身認知之間存在微妙差異。

9 大丸弘，〈兩大戰間における日本人の中国服観〉，《風俗》，卷27號3（1988），頁58-83。

10 サッポロビール株式会社サッポロビール博物館編，《ビールのポスター》（東京：

以說，作為摩登表徵的旗袍，席捲了東亞中日台三地。¹¹

我們可以在 1930-1940 年代照片中看到許多台灣女性已身著旗袍。畢業於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許玉燕女士，也就是畫家楊三郎夫人即為旗袍愛用者之一，在與台灣總督府高官夫人們聚會之際，或是與家族親友合影留念時，經常都穿著旗袍。作家張文環在小說「藝姐之家」中藉由女主角采雲呈現了當時旗袍的流行。「采雲回到台北時已經入秋，街上婦女的服裝大有改變，以前流行的（兩件式）衣裙，已經過時了，現在大家都改穿長衫（旗袍）」。¹² 但要注意的是，旗袍雖然風靡台灣女性，它扮演的角色是一種盛裝而非便服。以一般女性家居服來說，年長一輩多習於穿著傳統的兩件式衫褲，也就是日人所稱的「本島服」，年輕一輩則以洋裝居多。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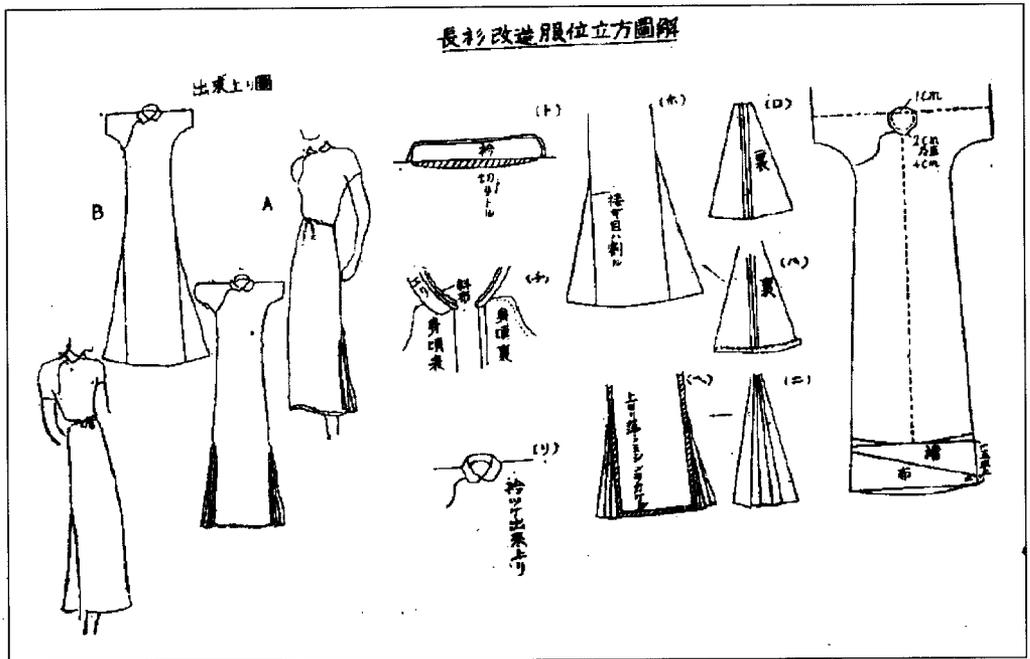
進入所謂皇民化運動時期，旗袍開始受到殖民地政治暴力的介入。某些地方行政單位如台北州就對去除台灣女性服裝上的中國色彩顯示出積極態度。論者認為推行皇民化運動之際，「支那式」衣服習慣與「國民意識」、「國民感情」在本質上兩相矛盾，應加以指導，不可等閒視之。婦人服「改善」重點有二，一是將中國式鈕扣改為按扣或是西式鈕

クレオ，2000），頁 45。

- 11 洪郁如，〈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ファッションと権力〉，頁 9-12。
- 12 張文環，〈芸姐の家〉，《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 年 5 月），收錄於河原功、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卷 4（東京：綠蔭書房，1999），頁 107-147。
- 13 在筆者訪談 1920-30 年代出生，也就是戰爭時期 15-25 歲前後的台灣女性，幾乎一致表示當時大多穿著洋裝，沒有穿著本島服的經驗，至於長衫則因人而異。洪郁如，〈簡淑循女士訪談紀錄〉，2007 年 6 月 2 日，未刊稿。洪郁如，〈黃采霞（穎川霞）女士訪談紀錄〉，2008 年 6 月 8 日，未刊稿。這點在台北州教育局長德永秀夫對 1940 年左右台灣女性的衣著狀況也可得到證實，文中敘及：「現在年輕女性共通的傾向是不喜歡本島在來的支那服，大多已經改穿洋裝。其中有些人也把和服拿來當成盛裝穿著…，特別是年輕女性之中，依其學識與職業不同，有喜好穿著支那式所謂長衫者。…昔日上海進口型以排山倒海之勢流行一時，一直到今天，可以說幾乎每位婦人至少都擁有一件長衫，亦無過言」。德永秀夫，〈本島婦人服的改善に就いて〉，《台灣時報》（1940 年 1 月），頁 40。該文在隔月改以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北州支部名義，單獨印製成小冊子，以供宣導之用。內容大致相同。參閱，《本島婦人服的改善》（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北州支部，1940）。

扣。二是將旗袍腿部開叉加以縫合為裙狀【圖 1】。一則觀察 1938 年新竹街頭的報導指出，原本喜穿長衫的富家女多已改穿洋裝，連帶使得台灣人經營的洋裁店、裁縫補習班等生意興隆。¹⁴ 辜顏碧霞在她出版於 1942 年 9 月的小說《流》，也述及了當時北投農村女性們用剪刀剪去布製圓鈕扣之現象。¹⁵ 台北南署警務單位則通告管區中台灣人女給（女服務員）與酌婦（陪酒女性），為配合戰時體制，應禁止穿著長衫等「挑發性的服裝」，改穿樸實的連身衣裙或兩件式套裝。¹⁶

圖 1 旗袍改造法圖解



資料來源：《本島婦人服の改善》（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北州支部，1940），頁 6。

14 《台灣日日新報》1938.5.1 [23]，以下簡稱《台日》。

15 辜顏碧霞著，邱振瑞譯，《流》（台北：草根，1999），頁 165-166。

16 《台日》1940.11.10 [夕刊 2]。

將旗袍當成流行時尚的穿著，因中日戰爭而蒙上一層敏感的政治色彩。這個變化使得台灣女性心情複雜，1941年畢業於私立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的楊千鶴，描述了踏出校門後在參加同學會或各種聚會時，開始嘗試時髦的旗袍時所面臨的困境。「然而我在穿著長衫時，總是會有一種心理，讓別人知道可能會失笑的，友人們可能會說我多心了。雖然說不上孰為因孰為果，但如果不是和日本人朋友同行，穿長衫出門對我而言實在麻煩費勁，起初也沒有意識到這些，但有時察覺到他人責備似的眼神，都不免讓長衫的我心頭一驚」。¹⁷ 她提到了參加日軍攻陷新加坡的慶祝遊行時的經驗，擦肩而過的年輕日本人女性拋下的那句「真適合非常時期啊」，彷彿就是針對自己的長衫所說的。¹⁸ 正如其他服裝上的推行或管制，台灣總督府並無明文告示，而是任地方官廳自行處理，故而旗袍受到的政治壓力大小也因地而異。台北基隆等都市街頭，事實上旗袍風采依然隨處可見。周金波小說〈志願兵〉中，從東京歸鄉的台灣留學生明貴，認為戰時故鄉變化沒有想像中大，一名路過的旗袍女性吸引了他的眼睛，讓我不禁感嘆「還是長衫好」。¹⁹ 但是對台灣女性來說，1940年之後殖民地社會日益濃重的政治壓力下，堅持旗袍作為時尚表現，需要的卻是更大的勇氣。

事實上，從1930年代中葉旗袍流行之際一直到1944年日軍戰局惡化為止，日本人之間對旗袍所持見解也有一定程度的歧異。排斥旗袍者認為，旗袍袖短叉高，剪裁貼身，肉體曲線畢呈，不僅行動不便，而且欠缺「皇國婦人」應有的高尚氣質。²⁰ 相對於此，支持旗袍者則站在美學、節約資源、適合南方氣候的合理性。創辦於1941年的《民俗台灣》雜誌中，多處可見日人的旗袍禮讚。「夏天的長衫尤其美麗，經常遇到

17 楊千鶴，〈長衫〉，《民俗台灣》，卷2期4（1942年4月），頁24-26。

18 楊千鶴，〈長衫〉，《民俗台灣》，卷2期4，頁24-26。

19 周金波，〈志願兵〉原載《文藝台灣》卷2號6（1941年9月），頁8-21。收錄於河原功、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卷5（東京：綠蔭書房，1999），頁337-350。

20 德永秀夫，〈本島婦人服の改善に就いて〉，《台灣時報》，頁40。

令人忍不住回首的美人」。²¹ 或從美學角度描述旗袍穿在年輕女性身上的活潑模樣。「肩、胸、腰際的柔緩曲線奏出微妙的美感，下方全體如瀑布傾流般的直線清潔感，長衫統合兩者步調之中產生了動靜兼蓄之美」。²² 總體而言，旗袍贊否兩論中，同時包含了對突顯曲線美的優美與低俗的兩面評價。而台灣女性也在日人輿論分歧中，為穿著旗袍的合理化尋得一絲空隙。

（二）「改良」與「興亞」²³

日本對中國開戰，卻沒有徹底排除旗袍的另一個理由是，將盛行中國的旗袍加以改造，取其剪裁簡單節省布料且便於穿著的合理性，藉由「改良」使它變身成爲一種由日本主導的東亞共通的「興亞服」。這種論法特別時興於 1940 年以後，標準服制定之前。當時報章曾以兩張照片介紹了東京流行，採用中國服的優點，與歐式洋裝折衷所製作的夏季用「興亞服」【圖 2】。並說明：「無論從醫學或服飾觀點都一致認為，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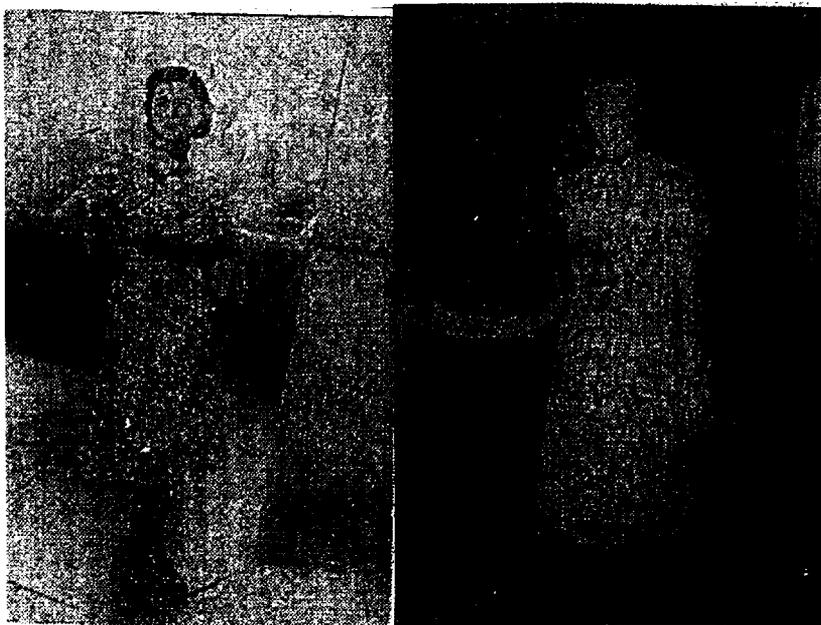
21 瑞光，〈乱彈〉，《民俗台灣》，卷 1 期 2（1941 年 8 月），頁 26-27。

22 宮田弥太郎，〈春と長衫〉，《民俗台灣》，卷 2 期 2（1942 年 1 月），頁 36-37。但同時又感嘆著「然而這種由美的事物賦予本身價值的單純的美，在今日情勢的時代效用觀點來看，卻不得不做實質面的考慮」。值得注意的是，以《民俗台灣》同人為中心的旗袍禮讚也牽涉了性別觀點、殖民地異國情趣等種種內在問題，這將另稿討論。

23 在日本史上「興亞」一詞源自萌芽於明治時代初期的「興亞主義」，它和福澤諭吉著名的「脫亞論」同樣是日本面對歐美帝國主義勢力在亞洲的急速擴張之下產生的思潮。特徵在於提出「亞細亞」這個模糊的地理概念，尋求亞洲各國的協調與提攜，做為對抗歐美的立足點。由成立於 1880 年的「興亞會」之思想與活動可知，所謂「興亞主義」一方面雖大力喚醒亞細亞民族對自身從屬地位的自覺，另一方面，他們對於長久以來以中國為中心的序列結構抱持否定態度，強調應以維新成功的「進步」日本取代「落後」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對抗歐美的課題上，「興亞」論者認為現實亞洲文化傳統與社會狀況更是應該改革克服的對象，日本正是推動完成「興亞」任務的主角。至於日本是否屬於亞細亞一部份的問題，立場則極為模糊分歧。同種論調也出現於中日戰爭日本所謂「東亞新秩序」、「東亞聯盟」或「大東亞共榮圈」等口號中。參見，並木頼壽，《日本人のアジア認識》（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包括本文所提之「興亞服」一詞在內，我們可以發現對中開戰後「興亞」幾乎成爲一種流行的標語口號。

有其他服裝比支那婦人服更利於保健，不像其他服裝需要衣帶縛綁身體，而且圓豐自然，尺寸立體」。²⁴ 日本美容界權威山野千枝子也為興亞服搭配日本風格的髮型，並談到：「和服之美已是不須贅述，但在今日需要更具活動性的服裝，特別是今後進出東亞大陸的婦人將漸增多，興亞服就是為此考究出的合適服裝。興亞服是站在滿州與支那服裝基礎上所設計的，在確立東亞新秩序之後，期待亦能普及於盟邦女性」。²⁵

圖 2 『興亞服』



資料來源：《台日》1940.7.7 [夕刊 3]

「興亞」的政治口號，節約布料符合戰爭需求的論理，也巧妙地被台灣女性利用為穿著旗袍的理論根據。楊千鶴述及，「去年夏天左右，

24 《台日》1940.7.7 [夕刊 3]。

25 《台日》1940.8.10 [夕刊 3]。本文討論的戰爭時期服裝問題，在日本其他殖民地或佔領區如滿洲國情況如何，留待日後繼續探討。

短及膝的長衫氾濫街頭，被冠上『興亞服』這樣的嚴肅名稱，而且被拿來和傳統式長及腳踝的長衫之間進行優美論的討論。雖說衣短不適合晚上外出或聚會穿著，但想到短式長衫感覺活潑，而且布料只要兩碼三就足夠，非常經濟實惠，因此我雖在意著露出的雙腿，還是常常穿著短式長衫到榮町街頭去」。²⁶ 可以說，戰時日本的東亞盟主論調，與企圖徹底去除中國色彩的皇民化方針顯露出邏輯上的矛盾。穿著旗袍在戰爭時期雖然在部分地區遭受干涉，或招致部分日人敵意眼光，但依然流行於台人年輕女性之間，一直到 1943 年末進入空襲時期，旗袍才真正從街頭消失。

三、皇民化與效率化之間的矛盾：和服的意義

（一）和服經驗

另一方面，戰爭時期為從精神與型式內外兩面達成皇民化，在標準服制定之前，日人教化團體與輿論界多鼓勵包括原住民族女性在內的台灣女性改穿和服，其重點在於強調大和精神，達成所謂日本化。

事實上，台灣女性穿著和服的經驗遠遠早於皇民化運動，這類事例從 1920 年代便零星可見，進入 1930 年代特別在戰爭時期大為增多。而必須強調的是，和服始終是作為一種新式盛裝來穿著，這種接受型態在服裝功能上屬於對外性、一時性的，並未融入台人原有日常服裝習慣之中。²⁷ 這種非日常性的服裝，包含有儀禮性與節慶性兩層面功能。就儀禮性而言，多出現在與日人交際應酬場面，或是以日人為中心的殖民地公共活動，如台人學生、教員參加學校活動，或是台人領導階層出身女性側身殖民地社交界從事「夫人外交」之際，往往可見和服登場。就節慶性而言，傾向把和服視為一種充滿異國情趣的流行時尚，偶爾穿著和服盛裝出

26 楊千鶴，〈長衫〉，《民俗台灣》，卷 2 期 4，頁 24-26。

27 洪郁如，〈ファッションと植民地の近代—台湾の場合—〉，《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植民地近代とモダンガール》（平成 15 年度～18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A) (1) 研究課題番号 15201057 研究成果報告書，2007），頁 125-128。

遊，攝影留念，體驗變身樂趣。²⁸ 台灣女性穿著和服，難以單純解釋為對政策之順應。

和服無法落實於台灣女性衣著習慣，其原因極為複雜，就服裝本身的特質上，第一，和服並不適合亞熱帶台灣氣候，冬季之外重層式穿著可說燠熱難耐。第二，由於需要使用大量布料，添製和服價錢昂貴，非一般民眾經濟能力可負擔。第三，和服在整理收藏與修改翻新上有一套獨特方式，非自幼生長和服環境難以習得。當時台北帝國大學教授中村哲就指出，日本女性的和服是極不適用於活動的奢侈品，獎勵台人婦女改穿洋裝尚可行，改穿和服根本毫無意義。他認為以皇民化之名，硬將日本古來不便之物，強迫台灣人接受，自然成效不彰。²⁹

第四，更重要的是，和服作為服裝本身與身體之間的內在連動關係。穿著和服並不單純只是一種著衣行為，它要求正確的穿法，與日本式的舉止動作。服裝的文化表現，必須以「衣服」與「身體」兩方面協調達成。在殖民地情境下，日本傳統「衣服」與台灣人「身體」兩個相異的文化符號在構造上兩相對立。台灣女性要以和服姿態出現日人公共空間，必須嚴守正確穿法（特別是前身衣領、衣帶、後領等部分），來面對日人的審視。1920年代之後，高等女學校以上學歷的台灣女性，在課程中正式接受和服縫製與穿法、以及包括身體動作的「禮儀作法」訓練。在下一小節楊千鶴的敘述中可知，這批新世代女性們熟知全套「和服」文化知識與技法，但同時也是對日人視線最為敏銳感知而倍感壓力的一群，對於缺乏「文化訓練」的即興式和服穿著，態度趨於謹慎與否定。

（二）和服獎勵

但在1937年中日開戰之後，隨著皇民化運動的展開，包括原住民女性在內，台灣女性開始被鼓勵穿著和服，推行和服之風在全島各地陸續出現。動員對象包括有(1)受雇或任職於地方官廳、公學校的台人及家眷，

28 洪郁如，〈ファッションと植民地の近代—台湾の場合—〉，《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植民地近代とモダンガール》，頁125-128。

29 中村哲，〈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台灣時報》（1941年1月），頁11-12。

(2)女子青年團等教化組織，(3)公學校、高等女學校學生，(4)藝妲、女給（女服務員）。如新竹、羅東、東石等地，甚至有地方官廳發通牒給管區內街庄和公學校，指導台人教職員要改穿和服。³⁰ 女子青年團除本身要實踐和服，亦被賦予推廣至全村落之任務。³¹ 女學生方面，台北第三高女學生在日人女老師指導下，身著自己縫製的和服，學習並表演日本舞踊。³² 在大稻埕女給與業主的服裝改良座談會上，決議女給每人應添製一套和服，並於每周一神宮皇居遙拜日穿著和服接客，高雄女給穿浴衣（夏天單件式和服）接客也受到媒體讚賞。³³ 另外也有報導藝妲身穿和服遊街「祈願武運長久」。³⁴ 值得注意的是，勵行和服並不是由總督府所主導，而是任憑地方官廳各自推行，因此出現各地成效不一之狀況。³⁵ 再者，媒體雖然大肆宣揚的台灣人女性和服普及，其實多限於殖民政府可以直接管理動員的各式機構與團體。

有趣的是，即使在提倡和服以達皇民化的時期，在台日人集團之中意見也並不一致。為徹底達成服裝上的同化與皇民化，大義名分上無可厚非地，必須勸導台灣女性服裝走向日本化，但我們看到在台日本人對於異民族台灣女性身著和服一現象，顯露出極為矛盾之心情。在理解其為同化政策一環之同時，卻難以忍受隱約浮現的「和服台灣化」問題。具體而言，一方面台灣女性穿著和服，模糊了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民族界線，讓在台日人感到不安，另一方面是台灣式身體動作，讓在台日人感到和服表徵的日本文化受到內在性的威脅破壞。皇民化運動時期，一名日人男性在大稻埕悄悄尾隨兩名身著正式和服「紋服」的少女，他

30 《台日》1937.9.30 [夕刊 2]，1938.1.8 [9]，1938.1.17 [5]，1938.2.21 [7]，1938.2.28 [2]。

31 《台日》1937.12.27 [7]，1938.8.7 [5]。

32 《台日》1937.4.13 [夕刊 3]。

33 《台日》1938.1.23 [7]，1938.4.1 [5]。

34 《台日》1938.3.2 [5]。

35 蔡錦堂研究同時期台灣人家庭正廳改善運動與寺廟整理運動時同樣指出，這些運動並不是由總督府主導進行，而是聽由各地方官廳自主推動，因此各地出現執行程度不一之情況，而這些運動當然是總督府所樂於見到的，因此採放任態度。參閱：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頁 37、44-45。戰爭時期公權力介入服裝問題的形式構造，與此顯然有共通之處。

始終懷疑她們是本島人。「曬得過於黑黝的後頸與白色衣襟形成一種奇妙的感覺，腰部以下特別是衣服下擺，日式布襪到夾鞋等非常不協調，彷彿是從哪借來穿的，好像是出現在笑鬧劇裡的男扮女裝，紋服應該有的清楚動人與尊貴之美被滑稽化了」。³⁶ 楊千鶴在〈長衫〉文中，對於來自日人女性的嚴峻視線也有深刻描述。「曾經有一陣子常在街頭看到身穿和服的本島婦人，每次我總是為她們的領口和衣帶提心吊膽，彷彿是自己的事，擔心著同行的日本人友人會作何觀感，每次總如我所料，友人皺起了眉頭」。³⁷ 在殖民地，「日本／衣服」與「台灣／身體」之間的緊張關係，引發服裝「越境」的複雜性，使得獎勵台灣女性穿著和服一事難以獲得日人一致支持。

皇民化運動在台提倡和服以示忠誠的同時，卻面臨來自日本國內和服改革的強烈衝擊。中日開戰之後，日本政府當局開始正視和服在活動面與資源面缺乏效率與浪費的問題，並藉由制定男性「國民服」與女性「標準服」來試圖進行改革。然而很諷刺地，女性「標準服」制定之舉，給和服帶來負面評價，迫使殖民地為政者在立場上，再也無法冠冕堂皇地強制和服使用。這股和服推行風潮在 1940 年末之後終告尾聲，而被來自日本國內的標準服新風潮取而代之。

四、殖民地情境下的「標準服」

（一）近代日本的服裝改革與戰爭動員

從 1920 年代起服裝改良一直是日本國內主張生活合理化的論者們長期關切的問題。在女裝方面，和服在服裝結構上不利活動的缺陷，已經成為服裝論者的共識。但在解決方法上則分兩派路線，一派主張推行以洋裝取代和服，另一派則主張以改良來達成和服的現代化。實際上，雖然東京大震災之後，隨著摩登女郎風行一時，洋裝漸漸普及年輕一代女

36 安藤公乙，〈台北で見た婦人達〉，《台灣婦人界》，1938 年 11 月號，頁 34-36。

37 楊千鶴，〈長衫〉，《民俗台灣》，卷 2 期 4，頁 24-26。

性，但整體而言，和服仍為戰前日本女性主要穿著，一直到戰後很長一段時期，其地位依然屹立不搖。

為了配合戰爭進行，1930年代日本政府注意到統制服裝的重要性，開始以男性為對象擬定製作所謂「國民服」，並於1940年1月正式發表。³⁸ 同年11月1日以敕令第725號公布並同時實施「國民服令」。服裝統一政策，同時也是達成公私一體、統制身體與心性、將戰時經濟浸透到私生活領域的重要國策。³⁹ 藉由「服裝」這個最為明顯可視的外在指標，來凝聚非常時期國民意識，加強對國家之向心力，並達成節約布料資源。

實際在制定國民服與標準服時，日本當局與服裝界權威人士面臨的共同困境是，以往生活改善論述中多在獎勵洋服，在理論上，雖然活動性以洋服為佳已成共識，但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交戰時期，採用洋服為統一服裝顯得尷尬。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國民服與標準服製作與宣傳過程中，再三強調著所謂「日本式」與「民族傳統」。即使最後決定的國民服與標準服樣式中，許多都類屬洋服。以國民服為例，是一種類似西裝和軍服的折衷型態，為追求戰時機動性，設計與色彩上自然與軍服相近，另一方面為了和西裝有所區別，又特意強調免去穿襯衫打領帶等等就是「日本」特色。⁴⁰ 它試圖取代的，是當時公務員與公司職員階層

38 根據村上雍子研究指出，研究制定國民服構想最早可溯自1929年，陸軍被服本廠內設置了被服協會，以陸軍省經理局長為理事長，軍關係者之外，亦網羅多名服裝界權威，試圖達成軍民被服之接近。之後隨著中日戰爭演變國民服制定漸次具體化。1937年7月的纖維統制，9月實施輸出入品等臨時措置法，12月頒布棉製品與人造纖維等混用規則，1938年3月公布綿系配給統制規則，1939年9月又公布纖維製品製造限制規則，1940年1月正式制定男子國民服，7月公布奢侈品等製造販賣限制規則，11月實施國民服令。1941年4月實施生活必需物資統制令，1942年2月實施衣料切符（配給）制，並制定婦人標準服。參閱：村上雍子，〈たかがモンペ、されどモンペ—戰時下服裝の一考察—〉，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戦争と女性雑誌—1931～1945年—》（東京：ドメス出版，2001），頁259、267。

39 若桑みどり，〈総力戦体制下の私生活統制—婦人雑誌にみる「戦時衣服」記事の意味するもの—〉，早川紀代編，《軍国の女た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197。

40 井上雅人，《洋服と日本人—国民服というモード》（東京：廣濟堂出版，2001），

一般上班穿著的西裝，一方面也試圖對近代日本男性公領域著洋服，私領域著和服的「二重生活」進行改革。期待普及公私兩用的國民服，將國防色彩帶入家庭空間，同時也達成布料節約之目的。

女性「標準服」的制定同樣也在服裝統制延長線上展開。婦人標準服的意義與國民服稍有不同，婦人標準服的制定，著重在改良傳統日本女性服裝有礙行動之弊，以配合戰時需要。因此，如果說男性的國民服偏重在國民精神的象徵取向，女性標準服則較偏於實用取向。戰爭不僅帶來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的社會需求，即使以家庭為生活場域，戰時防空演習、避難、勞軍等活動，要求女性身體發揮更高的勞動、行動力。

日本政府發布的婦人標準服，因為拘限在表現所謂「日本精神」與女性特質，結果折損了活動便利的功能。⁴¹ 所謂「日本精神」表現在上衣採用了和服樣式。再者，傳統性別差異觀念影響下，標準服制定過程中，居主導地位的日本男性對女性著長褲普遍表示反感，因而採裙裝者居多。⁴² 1942年2月公布的所謂婦人「標準服」多達六種型式【圖3】，半數為傳統和服之改良型，半數為上衣採日本式領口交叉傳統的改良式洋裝。五種型式皆為裙裝，只有「活動衣」採褲裝型式，用日本式上衣搭配在腳踝處緊縮的長褲（採西式長褲剪裁法のモンペ）。

空襲日常化之前，即使在日本國內，女性的標準服推廣運動和男性的國民服一樣績效不彰。然而隨著戰局惡化，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日本國內一般女性們所逐漸接受的是モンペ，而不是政府推獎的標準服。

頁 82-27。

41 關於婦人標準服設計上，服飾專家對當局強調「日本精神」感到困惑與折衷妥協之過程，可參閱：村上雍子，〈たかがモンペ、されどモンペ—戰時下服装の一考察—〉，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戦争と女性雑誌—1931～1945年—》，頁 255-280。

42 井上雅人，《洋服と日本人—国民服というモード》，頁 172-178。

圖 3 婦人標準服



資料來源：《被服》，卷 13 號 2（1942 年 3 月）。重引自：村上雍子，〈たかがモンペ、されどモンペ—戦時下服装の一考察—〉，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戦争と女性雑誌—1931～1945 年—》（東京：ドメス出版，2001），頁 263。

（二）婦人標準服在台灣

前面提到，戰爭時期日本中央對服裝問題的重視首先出現在男性的國民服製作。最初目的在提高非常時期備戰精神，隨著戰局演變重心漸轉至國民總動員與節約資源的現實問題。至於女性的標準服製作也同樣在其延長線上。無論是男性國民服或是女性標準服的導入，台灣總督府都是在追隨日本國內的大原則下，再予以調整。

標準服在台灣實施，皇民奉公會扮演了主導角色，⁴³ 在第一線推廣過程中實際提供樣式設計與裁縫技術的則是設立於台北市的吉見裁縫學園園長吉見まつよ，以及各地高等女學校的裁縫教師。特別是吉見園長之意見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1941年，吉見裁縫學園已經積極參與日本國內標準服設計競賽，獲乙等入選。⁴⁴ 吉見並受厚生省委託改良研究符合台灣特殊氣候的服裝。吉見對於標準服的看法可納為二，第一，必須廣具融通性，不應強制所有女性穿著同一型式服裝。第二，符合台灣特殊環境。「能同時調和日本人、本島人、高砂族、其他所有台灣住民之生活，並嘗試藉由服裝，達到彼此相親無隔閡，精神與實際生活相一致。以服裝達成生活之自我刷新，期待收到皇民化之成果」。⁴⁵ 基本上，吉見的理念皆為日後奉公會所採納，並反映於1942年的決議中。

1942年5月25日，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召開臨時部長會議，正式選定了台灣婦人標準服。⁴⁶ 制定過程中，參與這項計畫的成員有皇民奉公會厚生委員、婦人委員與服裝關係「權威人士」，特別委員會召開會議十數次，並派遣婦人委員赴中央，直接參與厚生省婦人標準服制定幹部委員會，根據該省制定之婦人標準服加以檢討。結果從公布於日本國內的婦人標準服中，選擇了甲型二部式一號、一部式一號、乙型二部式三種，作為基本型【參閱圖3】。同時在不違反大原則的範圍內，加上合

43 總督府於1941年4月19日設置皇民奉公會，以所謂皇民奉公運動承續1937年以來的皇民化運動。參閱：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頁87。

44 井上雅人，《洋服と日本人：国民服というモード》，頁67-68。

45 《台日》1941.5.23 [夕刊3]。

46 《台日》1942.5.26 [3]。

乎台灣及「南方地域」特殊狀況的應用型三種，決定出可作為日常服、外出服、禮服之婦人標準服。⁴⁷ 整體來說，站在提高戰時國民精神與動員女性勞動力的觀點上，皇民奉公會對於推行婦人「標準服」表示肯定態度。我們可以從奉公會公布的標準婦人服設計基本要點窺知，其理念與日本國內並無二致。⁴⁸ 如第一、二項「應求適合日本婦人之服裝，並以能表現日本特質為基本理念」、「戰時今日應避免輕佻浮華，整齊儀容以顯揚真正日本婦人的簡素之美」強調在抽象的精神層面。第三至第六項「因應強化民族之時代要求，制定有益於婦人保健之服裝」、「最能增進婦人活動能率之服裝」、「有鑑於當下纖維供應情況，必須考慮到活用舊衣，節約衣料等經濟之利」、「配合婦人生活，貫徹自家裁縫主義」，則從人口優生角度、戰時活動效率、節約纖維資源、自家裁縫等具體功能強調了標準服必要性。

對戰時殖民地台灣來說，考慮服裝問題的同時必須去處理氣候問題，以及用統一服裝涵蓋統治與被統治諸民族時可能衍生的問題。從另外委託吉見裁縫學園園長吉見まつよ設計婦人標準服三種應用型一事來看，皇民奉公會並不傾向把厚生省制定的標準服照單全收。氣候問題不僅關係台灣本身，同時也涉及南進問題。第七項「考慮台灣及南方特殊情況」指出對暑熱期長，溫度變化劇烈且多濕氣等氣候風土條件之考量，避免對衛生身心產生不良影響，導致生活力減退。同時對島內日台原住民各民族服裝傳統互異，標準服必須關照到各族皆宜。「本島同時存在有和服、本島服、蕃服、洋服，各具足以為傲的傳統優點特長，如何各取所長、兼顧所好，設計出內台與高砂族共通，皆可穿著的標準服，是為要務」。值得注意的是，這項聲明中並沒有用製作標準服，來否定其他原有服裝之存在。

婦人標準服制定之後，奉公會大力宣導，1942到1943年間，以吉見與各地高等女學校裁縫教師為率，在全島大都市陸續舉辦標準服展示會

47 應用型三種具體樣式如何，惜因圖像資料不足無法做進一步討論。

48 《台日》1942.6.18 [4]。

及裁縫講習會，⁴⁹ 但效果依然不彰，雖名為標準服，型式又多達六種之多。加上並非強制性質，普及程度極為有限。可以說，標準服在殖民地台灣的命運與日本國內相仿。1944年之後，報章雜誌上已不見關於標準服之報導。在筆者訪談經驗中，未有提及穿著標準服經驗者，在戰爭時期照片之中，也幾乎不見身著標準服之女性。婦人標準服最大的障礙，乃是來自於モンペ的競爭。

五、「戰爭時尚」與モンペ

（一）戰爭需求與戰爭時尚

1930年代起台灣也開始了防空演習，モンペ是當局因應戰爭動員而推廣的衣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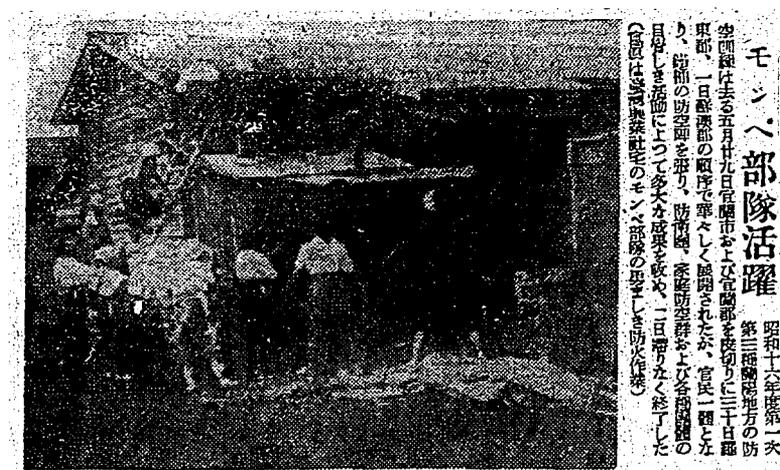
モンペ原為日本東北寒村的農婦穿著，戰爭時期因這種褲裝較和服利於活動，1930年日本對中開戰後，隨著後方女性農務與勞務動員增多而逐漸流行開來，由農村擴及都會地區，並受到軍方支持。但是社會一般對此仍難以接受，第一在於性別要素，習慣於傳統女性和服形式的日人社會特別是男性，對於女性露出兩腿形狀的褲裝極為反感，認為モンペ粗野下流，毫無女性美。因此在上一節我們可以看到，制定的各式標準服皆為裙裝，唯一只有活動衣為褲裝。第二在於服裝美學與形象。經歷1920年代摩登文化洗禮、熟悉洋裝立體美的都會女性，則認為モンペ缺乏美感宛如村婦，在接納上顯得消極，因為モンペ是日式平面剪裁，加上和服腰下衣擺塞入モンペ，使得下身顯得膨脹。第三為意識形態要素，有一部份知識女性以拒穿作為對戰爭強制的無言抵抗。到戰爭緊迫時期，長褲型式都被泛稱為モンペ，⁵⁰ 上衣採和服形式，成為維持日本傳統與戰時合理性效率性的一種折衷。

49 《台日》1942.6.4 [夕刊 2]，1942.6.12 [日刊 3]，1942.7.12 [日刊 3 版]，1942.7.26 [日刊 4]，1943.11.5 [夕刊 2]，1943.11.19 [夕刊 2]，1943.11.26 [日刊 4]。

50 村上雍子，〈たかがモンペ、されどモンペ—戦時下服装の一考察—〉，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戦争と女性雑誌—1931～1945年—》，頁272。

在殖民地台灣，モンペ重視在凝聚女性備戰精神上的強調，遠遠高於強化行動力的服裝改革意義，這是和日本國內最為不同之處。防空訓練中，「モンペ」被視為一種後方女性動員、愛國報國的表徵。相對於前線軍隊的戰鬥行爲，女性在後方的防空防火訓練在視覺上被描繪為「モンペ部隊」【圖 4】。1940 年左右開始，報紙有關「モンペ部隊」活躍

圖 4 有關「モンペ部隊」從事後方消防演習之報導



資料來源：《台日》1941.6.2 [4]

的報導日漸增多。如基隆市防空訓練中參加「家庭防火群」的婦女皆穿モンペ。⁵¹ 三個月後台北州也在防空訓練中組織所謂「家庭防火群」，以五至六戶為一組，規定參加婦女穿著モンペ。⁵² 其後更廣泛見於台中、新竹、羅東、台南等全島各地。桔梗俱樂部部員走上街頭勸人改穿モンペ、甚至有「精神上也要穿上モンペ」這樣的說法。⁵³ 相對地，至於藉

51 《台日》1939.12.11 [3]。

52 《台日》1940.2.12 [11]。

53 這是服裝專家吉見まつよ之言，吉見本身並非モンペ擁護者，她反對形式主義地強制女性穿著モンペ，在這篇報導中，她主張以修改手邊舊衣以因應戰時需要即可，

由モンペ達成服裝改革的言論則不多見。原因之一，就在台日本女性而言，年輕一輩已經改穿洋裝，中年以上在炎熱季節較長的台灣，穿洋裝機會也較日本國內為多。由於和服並不同於日常便服，改良急切度較日本國內為弱。再者，由於氣候炎熱，モンペ也難以做為服裝改革的最佳選擇。原因之二，就占女性人口絕大多數的台灣女性而言，傳統式的「本島服」衫褲被許多論者一致認為足以因應戰時需要。換言之，民族要素與氣候要素，導致モンペ在殖民地台灣被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

包括日人與台灣人在內，モンペ穿著的情境在台灣有以下特徵，第一，在台日本女性在先，漸及於包括原住民族在內的台灣女性。第二，通常見於女性動員組織，而非個人獨自選擇。如官廳住宅區的官員女眷組織、以台人日人未婚女性為成員的桔梗俱樂部、統合愛國婦人會與國防婦人會所組成的大日本婦人會、各級學校女學生、各地區以保甲為單位的婦人團，或是防火班、救護班等。第三，所謂モンペ，在服裝型式上同時包含在腳踝處緊縮之日本式與西式長褲兩種樣式。甚至到戰火熾烈之際，竟泛指所有褲裝。第四，モンペ主要用在配合防空演習或女性勞務動員等，並沒有成為日常穿著，在演習時間或勞動時間內穿著，一結束則換下。⁵⁴ 換言之，它是屬於「公」而非「私」性質的服裝。

在殖民地台灣的日人集團之間，對是否推廣モンペ的意見極為分歧。不但上述日本國內的贊否論調在台同樣可見，強調台灣特殊條件的幾個

並稱之為「精神上的モンペ」（《台日》1943.12.13 [夕刊 2]）。

- 54 居住彰化鄉間的魏香女士回憶，モンペ多已製成成衣在街頭販賣，價錢也不貴，因此就直接購買，沒有自己縫製的經驗。特徵為「國防色」（卡其色），在腳踝處緊束，有單賣モンペ，也有配上衣成套販賣的。モンペ只有在防空演習時穿著，家家戶戶的主婦排成一列傳遞水桶進行滅火演習。平時則不穿モンペ，而是穿一般洋裝，1944年懷孕待產，1945年4月產後，也都是穿自己的洋裝，跑防空洞。（洪郁如，〈魏香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8年10月31日）。戰時就讀於私立台北女子高等學院（1942年4月入學1944年3月畢業）的姜蕙英女士表示，課堂上要自行縫製モンペ。モンペ有和服式縫製，也有西裝褲型式，當時台灣女學生穿著的是西裝褲型式。母親曾將手上有有的和服改作成モンペ。但是上下學並沒有穿著モンペ，而是當成作業服（也就是工作服）穿著，比如說當天要從事農作服務等等戶外活動時，才換穿モンペ。（洪郁如，〈姜蕙英女士訪談紀錄〉未刊稿，2008年11月6日。）

論點應加以注意：第一，氣候因素，緊綁腳踝的長褲不適宜台灣炎熱氣候。有人譏笑穿著モンペ有如一隻來自北海道的熊，出現在台灣顯得滑稽。⁵⁵ 第二，台灣女性傳統服裝則為褲裝，業已符合戰時需求。上身為「衫」，下身為「褲」，寬鬆涼爽且行動方便，不需要導入モンペ，多此一舉。吉見まつよ讚美台灣人傳統服裝：「關於本島人的服裝，家居穿著的兩段式衣服在衛生面，和活動面上都極為優良」，只要在細部稍加改良就更為理想。她並且否定了モンペ的所謂實用性：「最近只要是防火演習，幾乎每個家庭班都穿著モンペ。但是對不習慣穿モンペ的人來說，反而會妨礙行動。因為モンペ本來是雪國的穿著，為了避免直接碰觸到冰冷的雪，所想出套穿在和服上的設計。說實在話，在台灣穿著有些不適當。當然，緊急時能覆蓋腳部最為安全，只要把男性長褲在腰部稍加修改就可以成為女用長褲使用，反倒是モンペ，若縫製方法不佳，會皺成一團，非常難穿。還有腳踝部束緊的話，在這炎炎夏日實在不堪想像」。她勸告女性們認為「不是看別組都穿モンペ，自己組上也就非穿不可，而應該是考慮穿哪種服裝最有效率、看起來也最美才是」。⁵⁶

另一方面，以モンペ凝聚備戰精神的方式也受到論者質疑。台北帝大教授中川正指出，「在女子服裝方面，不論對日本人台灣人都獎勵穿著モンペ，但獎勵モンペ的初衷在於促使婦人在非常時期能夠行動敏捷。在對本島人婦女推行モンペ時，重要在於不流於形式。本島婦人傳統以來就有類似男子長褲的服裝，將之改良符合非常時期所用，就可達成推行モンペ的預定目的。最近竟聽說有強制農村婦人，將原本可做本地固有的婦人長褲兩件分的布料，拿來做為縫製モンペ一件分之用。如果想拿モンペ做為皇民練成之用，恐怕是有些勉強。雖說以端正服裝來引導人心也有幾分理，但是モンペ根本談不上是日本精神的精粹。說是來自日本國內，也不過限於部份地區。如果說是要補救日本式婦人服在活動方面的缺點還說得過去，若要提高台灣婦人的精神警覺，在手段上應可另

55 統或少女の日記抄，〈乱彈〉，《民俗台灣》，卷2號1，頁30-31。

56 《台日》1941.9.4〔夕刊3〕。

謀他途」。⁵⁷ 簡言之，在日本國內和服改革之延長線上思考，モンペ尙可推行於在台日本女性，但若強制於台灣女性，不論是在服裝改革面、資源節約的經濟效益面、皇民化精神動員面，都缺乏合理根據。

「本島服」的便利性與合理性受到反對モンペ的日人所肯定，但有趣的是，台人新世代女性卻難以接受之。當時台灣服裝權威的吉見まつよ極力讚美台灣傳統衣衫，並鼓勵門下台灣人女學生改穿台灣式的「褲」，但是女學生們卻一笑置之。⁵⁸ 原因之一在於1940年代的台灣服，在形象上已是農村居民或年老世代的衣飾。自然難被這些出身富裕，自幼習於洋裝的台人女學生所接受。其二則在服裝美學上，台式褲爲平面剪裁，穿著時體型顯得平坦，加上臀部中間形成一條斜線，⁵⁹ 新生代認爲有礙美觀。因此當戰時活動性受到重視時，反倒是外來的モンペ，容易被年輕一代的台灣女性所接受。モンペ漸次普及於台灣女性的原因，無法單一從統治者的強迫來作解釋，モンペ同時也是戰爭下的一種流行時尚。

戰爭時期服裝選擇的自由逐漸受限之際，不論對台人或日人女性而言，モンペ也包含苦中作樂的成分。日人女性許多將原有手邊和服改製爲モンペ，許多色彩鮮豔，有紅色、黃色、藍色等等花樣，甚至遭論者批評像是日本傳統穿花花綠綠衣裳遊走街頭的叫賣郎。⁶⁰ 台灣女性選擇穿著的モンペ多爲西服長褲形式的剪裁，而非腰臀部膨大的日本式モンペ。搭配上衣也是洋裝多於和服。不論是成品型式購買的モンペ、訂做的モンペ、用手邊衣料改製成的モンペ，在布料方面並不馬虎。許多台灣女性在戰時身著モンペ合影留念，這些台灣モンペ被認爲比日本國內質感高級、剪裁美觀，沒有戰爭貧困悽慘之感。⁶¹ 我們不能忽視的是，

57 中川正，〈内台生活の交流について〉，《民俗台灣》，卷4號5（1944年5月），頁32-34。

58 吉見まつよ，〈婦人の褲〉，《民俗台灣》，卷3號10（1943年10月），頁42-44。

59 吉見まつよ，〈婦人の褲〉，《民俗台灣》，卷3號10，頁42-44。夏士敏，〈近代台灣婦女日常服裝演變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86-87。

60 李英，〈点心〉，《民俗台灣》，卷3號9（1943年9月），頁20。

61 筆者在從事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服裝與殖民地情境研究過程中常有之經驗。身著モンペ台灣女性照片，很少有日本國內モンペ所代表之悲慘貧困形象，這經常讓日本研

這群有能力接受モンペ的女性，多已屬經濟上有餘裕的階層，至於勞務動員下的農村婦女，在服裝上並無改變，依然身著傳統衫與褲。⁶²

（二）五花八門的戰時服裝景觀

1942年9月桔梗俱樂部分別在台北市榮町和太平町進行街頭服裝調查。或許因為難以從外表進行台人日人的民族區別，桔梗俱樂部選定了城內日人活動區域的榮町和較多台人活動的太平町兩個不同的區域分別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城內日人活動區域的榮町，年輕女性之中洋服遙遙領先，高達643人，和服為104人，只佔著洋服者的六分之一，著本島服者僅11人，剛剛開始宣導的標準服更少，只有2人穿著。但中年以上婦女則以和服居多，達416人，洋服有220人，約和服之半，本島服則為143人，無人穿標準服。在較多台人活動的太平町，年輕女性穿洋服者有583人，本島服居次，為170人，和服12人，標準服僅1人。至於中年以上女性則以本島服居多，有553人，次為洋服100人，和服為19人，無人穿標準服。⁶³ 在觀察中，旗袍似乎是被算入本島服範疇中。版畫家立石鐵臣在1941年進行的街頭調查，配合上使用語言的觀察，大

究者大為吃驚。

62 布料不足也是戰爭時期服裝問題上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但筆者認為其主要影響在添製新衣物等消費行為的抑制，實際上民眾生活中原有的服裝樣式選擇習慣並無明顯改變之跡象。棉毛原料進口受阻導致衣料缺乏的狀況下，人造纖維布料開始受到推廣，當時日文稱此代替品為「スフ」(staple fiber之略稱)或「ファイバー」(fiber)。這種代用纖維堅韌度不足，人們頗有怨言但也無太多選擇，「ファイバー」一詞甚至成為戰爭時期有此經驗的台人稱呼代用品或不良品的名詞，甚至沿用到戰後。關於這段歷史記憶請參見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頁157-158。但改用人造纖維布料的多半是公家機關特別是學校制服，我們可以發現1938年3月1日總督府令公布人纖混用規則之後一直到年底，《台日》始終配合官方宣傳人纖制服，進行社會宣導。由於布料不再如往常容易入手，手邊既有的衣物布料只好將就穿著使用。農村地區影響較大，家庭中衣物存量原本就不多，布料來源緊縮直接就壓迫到農民生活，從1944年《台日》頻繁呼籲與報導送衣到農村的活動，多少可以窺見當時狀況。

63 編輯部，〈皇民奉公會主催「生活科學展」に拾ふ〉，《民俗台灣》，卷2號12（1942年12月），頁36-37。

膽地將對象分爲本島婦人與日本國內婦人，在本島婦人 101 人之中有 61 人穿洋服，39 人穿本島服，1 人穿和服。而立石進一步指出，39 名本島服之中，包含了 18 名穿旗袍的女性，而且其中有 7 名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短旗袍。⁶⁴

表 1942 年台北市街頭服裝調查結果（桔梗俱樂部調查）

	榮 町		太 平 町	
	年輕女性	中年以上	年輕女性	中年以上
標準服	2	0	1	0
洋 服	643	220	583	100
和 服	104	416	12	19
本島服	11	143	170	553
合 計	760	779	766	672

資料來源：同註 63

以 1943 年 7 月登載於《台日》的兩張照片爲例，高雄街頭身穿所謂決戰服（泛指褲裝，詳見下一小節）的桔梗俱樂部成員，她們的服裝不是標準服，而是類似男性西服的時髦服裝，上衣爲襯衫加背心，搭配長褲而在腳踝處束緊，並非寬鬆的傳統モンペ【圖 5】。另一張是一名身穿短袖白襯衫搭配長褲的花蓮港的桔梗俱樂部成員，一起從事街頭募款運動的兩名大日本婦人會會員則是身穿和服，至於路過的女性則打著洋傘，身穿西式長裙【圖 6】。⁶⁵ 皇民奉公會屏東市支會會議中，男性幹部憤然指責女性的不合作。穿著決戰服的婦女只佔行人的 39%，而且是把モンペ配日式拖鞋的人也算進去的數字。其中還有日本人婦女穿鮮艷醒目的和

64 立石鉄臣，〈本島人女性の服装〉，《民俗台灣》，卷 1 號 3（1941 年 3 月），頁 29-30。

65 《台日》1943.7.9 [4]。

服在街頭走動。⁶⁶ 一直到 1944 年皇民奉公會在慶祝「大詔奉戰」二周年活動，在街頭呼籲島民穿著決戰服，也就是男性著腳絆，女性穿モンペ，但是未遵行的人還是不少。⁶⁷ 當時台北街頭有許多日人婦女把和服長袖塞成短袖，或藏到婦人會服裡頭，假裝是所謂決戰服，報紙專欄甚至感嘆，「決戰服到底是為誰穿的？不是為別人，應該是為保護自己吧」。⁶⁸ 許多地區開始派遣桔梗俱樂部部員走上街頭，監視勸導穿著華美和服的日人女性。

圖 5 身著所謂『決戰服』的高雄桔梗俱樂部成員



資料來源：《台日》1943.7.9 [4]

66 《台日》1943.12.5 [4]。

67 《台日》1944.2.15 [夕刊 2]。

68 《台日》1943.12.25 [2]。

圖 6 花蓮港大日本婦人會與桔梗俱樂部會員從事街頭募款活動時的服裝



資料來源：《台日》1943.7.9 [4]

由上可知，(1)即使已經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服裝基本上還是保持原有的狀態，人們各自穿著洋服、本島服、旗袍、和服、標準服等等不同式樣的服裝，在殖民地島都的街頭往來。(2)不論台人或是日人女性，年輕一輩絕大多數都已經洋裝化。(3)雖然皇民化運動下部分地區開始在旗袍或本島服上「去中國化」，但總體而言，包括旗袍在內的本島服依然可見。⁶⁹ (4)在總力戰下，日人女性的和服被指為奢侈且有礙活動，被勸導改穿標準服或モンペ，但街頭調查顯示，它依然為中年以上日人女性們的最愛。

同時我們也可以了解到，服裝問題，雖是戰時輿論界關注與討論的焦點問題，但不論對任何一種服裝的排斥、改造、推行上，即使日人集

69 畢業於私立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的黃鳳姿也在1943年發表的文章中述及，昔日台灣女性穿著兩件式衣裙或衣褲，而「今日則流行無袖長衫」。參閱，黃氏鳳姿，〈本島婦人の服飾〉，《民俗台灣》，卷3號10（1943年10月），頁30-33。

團內部都未能獲得一致意見，在意見分歧的膠著狀態下迎向戰爭終結。

（三）空襲與女性褲裝時代的來臨

盟軍的對台空襲，在戰時服裝變化上是一重要分水嶺。空襲體驗即戰場體驗，由於航空軍事武器的發達，開始出現空襲這種新的戰爭型態。前線與後方境界線消失，以往所謂後方支援前線的概念無疑已失去意義，後方也要在敵人攻擊中尋求自保，地區居民的組織化與動員，在防空目的下推展開來。⁷⁰ 1943年11月美軍和中國空軍合組盟機隊對台進行空襲，主要雖以新竹機場為目標，但對民間造成損失與震撼較以往為大。第一次大規模空襲發生在1944年10月，雙方爆發激烈空戰，日軍損失極大，此後面對美軍轟炸之際，再也無力由空中攔截。1945年1月為支援呂宋島登陸，美軍再度對台進行近三週的轟炸，自此到戰爭結束，台灣民眾幾乎每天都遭受空襲。⁷¹ 台灣真正開始遭受空襲之後，躲避空襲與從事軍事後援之際，便於活動的褲裝不但受到當局獎勵，同時也得到大多數女性喜好。旗袍、洋裝、和服都退居幕後，不論是現實或表像，モンペ開始成為戰時女性動員的外在特徵。

隨著日本戰局漸轉劣勢，1943年之後，獎勵穿著「決戰服」的呼聲逐漸取代了1940年開始風行於台灣的モンペ禮讚。所謂的「決戰服」，就女性而言，指的是徹底改穿褲裝。也就是原有獎勵モンペ的基礎上，型式又再加以放寬，女性的決戰服可以是日本式モンペ、西褲式モンペ，緊縮褲腳、一般長褲均被接受。以皇民奉公會台東支部為例，該支部所制定的決戰服裝基準在女子為「（一）皇民奉公會所制定的標準服。（二）短袖與モンペ」，同時又備註，在防空演習時女子穿著簡易洋服或是同等之輕裝，如原住民族婦人服亦可，但長衫則應嚴慎之。⁷² 換言之，モ

70 大岡聡、成田龍一，〈空襲と地域〉，《日常の中の総力戦》（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67-71。

71 張建傑，〈二次大戰台灣遭受戰害之研究〉，《台灣史研究》，卷4期1（1999年4月），頁153-160。大岡聡、成田龍一，〈空襲と地域〉，《日常の中の総力戦》（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72-74。

72 《台日》1944.03.11 [4]。

ンペ、標準服都被納入「決戰服」範疇，甚至基於節約布料資源、能用則用的政策方針，即使是一般褲裝或是洋裝也被允許。殖民地當局已經無暇對戰時女性服裝作瑣碎規定，唯一被嚴加屏除的，就是被視為帶濃厚中國色彩的旗袍。

1944年3月22日，皇民奉公會本部根據戰時厚生委員會衣部委員之匯報，對台灣全域各地方部發出「因應戰時之服裝基準」的通牒，指示所謂「決戰服」不必拘泥於一定形式，應活用現有之衣物，只要能保護身體並便於活動即可。⁷³ 男子決戰服可以是制服、團服、國民服、勞務服，或是手邊現有的西服，和服上衣為筒袖，配合モンペ型褲或是股引⁷⁴型褲，若備有緊急時可覆蓋露出部位的物品，防暑用的短袖短褲亦可。女子以窄袖上衣搭配モンペ的「活動衣」為基準，但也可以活用手邊的男用長褲或是本島式褲等，只要褲腳便於活動即可。換言之，戰爭末期服裝管制的大原則，已經從抽象的意識形態走向重視現實需要。

六、結 語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戰爭時期女性服裝問題顯現了幾層重要意義。

第一，服裝問題，存在著殖民主義意識形態與戰爭追求效率化之間的拉扯。戰爭時期服裝管制的第一要義，乃為求達成國民精神總動員，在日本本土提倡國民服與標準服以求全民制服化之際，在殖民地台灣當局則是在服裝的民族記號上進行操作。也就是以獎勵和服、排除旗袍來追求皇民化與達成去中國化。然而，皇民奉公會偏重消弭民族色彩的運動方向，卻和戰爭體制下追求戰爭合理化與效率化目標互相抵觸。殖民者無法以清潔衛生、便於剪裁、利於行動等等「科學性」來證明和服的

73 《台日》1944.3.23 [2]。

74 日本傳統男用長褲的一種，形式貼身，褲頭以布條繫於腰部，江戶時代以後普及為商工業男性的工作服之一。參閱《大辭泉 增補・新裝版》（東京：小學館，1998）。今日仍可見於日本傳統節慶時扛神轎的男性穿著。

優越。相反地，遭受攻擊批評的旗袍或是台灣在地傳統服裝，卻因節約資源以極具備活動性而獲得合理化基礎。

對於戰爭效率化帶給民族優越性的危機與內在矛盾，日本帝國習於用所謂「改良」來處理。服裝真否「改良」並非重點所在，重要的是，「改良」實行主體是日本，經過我手改造，他者的服裝意義上發生轉變，透過在修改與被修改之間重新產生高低位階感，以便吸收和編入日本帝國之中。因此，旗袍在資源節約的優勢雖獲日人服裝專家一致肯定，卻仍要透過「改良」變身為「興亞服」。本島服雖被認為適應氣候、節省布料、便於行動，卻也要在細部「改良」以臻完美。同樣論法也見於日本本土在國民服標準服的制定上，它是西服，卻必須被稱說是擷取西服優點制定的服裝，因此西方僅止於參考，國民服標準服依然被當做日本人創製之服裝來大肆宣傳。至於和服的非效率性，則是以モンペ做為新的日本表徵予以克服。在服裝問題發展上，我們看到了戰時日本為確保民族主導地位留下的歷史痕跡。

第二，服裝現象，存在著戰時全體化與現代個人本位流行文化之間的離合。而這些問題與矛盾在標準服、本島服、旗袍、和服、モンペ的政策與言說之間重疊交錯。即使受到時局氣氛下，穿著當局獎勵的和服、モンペ的女性行動本身，未必就是向政策靠攏。相反地，身穿旗袍不一定意味著女性的反日抗日。在後方女性們被要求以服裝輸誠的同時，女性們也以服裝作為自我表現方式。這是心有顧忌但仍著旗袍出遊的台灣女性，或是偷偷摸摸穿和服上街頭的在台日本女性，或是在モンペ上追求時髦現代感的台人日人女性們共通之處。我們看到1920年代之後席捲世界各地的摩登文化，不因戰爭而突告斷絕，它可化為各種型式，在戰火歲月餘韻猶存。摩登流行不必然會與民族主義琴瑟和鳴，日人服裝專家讚譽有加的本島褲，也沒有能因它的傳統性、在地性而獲台人年輕女性的青睞。在戰爭的大義名份下，政治力試圖介入女性的服裝穿著，而女性也不斷摸索著如何在戰時表現自我。

徴引書目

一、專書

- サッポロビール株式会社サッポロビール博物館編，《ビールのポスター》。東京：クレオ，2000。
- 井上雅人，《洋服と日本人—国民服というモード》。東京：廣濟堂出版，2001。
- 水野直樹編，《生活の中の植民地主義》。京都：人文書院，2004。
- 近藤正己，《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2007。
- 並木頼寿，《日本人のアジア認識》。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
- 高本莉，《台灣早期服飾圖録》。台北：南天書局，1995。
- 辜顏碧霞著，邱振瑞譯，《流》。台北：草根，1999。
- 葉立誠，《台灣服裝史》。台北：商鼎文化出版，2001。
-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台北：日創社文化，2006。

二、論文

- 大丸弘，〈兩大戦間における日本人の中国服観〉，《風俗》，卷 27 號 3，1988，頁 58-83。
- 大岡聡、成田龍一，〈空襲と地域〉，《日常の中の総力戦》。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61-90。
- 村上雍子，〈たかがモンペ、されどモンペ—戦時下服装の一考察—〉，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戦争と女性雑誌—1931～1945年—》。東京：ドメス出版，2001，頁 255-280。
- 若桑みどり，〈総力戦体制下の私生活統制—婦人雑誌にみる「戦時衣服」記事の意味するもの—〉，早川紀代編，《軍国の女た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 194-220。
- 洪郁如，〈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ファッションと権力〉，《接続》，期 4，2004，頁 2-26。

- 洪郁如，〈ファッションと植民地的近代—台湾の場合—〉，《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植民地近代とモダンガール》。平成 15 年度～18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1)研究課題番号 15201057 研究成果報告書，2007，頁 122-135。
- 夏士敏，〈近代台灣婦女日常服裝演變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張建傑，〈二次大戰台灣遭受戰害之研究〉，《台灣史研究》，卷 4 期 1，1999 年 4 月，頁 149-196。
- 楊雅慧，〈戰爭體制下的台灣婦女(1937-1945) ——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蘇旭珺，〈台灣閩族婦女傳統服裝的設計與變化——AD1860-1945〉。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三、報紙、雜誌

- 《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4 月—1944 年 3 月。
- 《本島婦人服の改善》，国民精神總動員台北州支部，1940。
- 中川正，〈内台生活の交流について〉，《民俗台灣》，卷 4 號 5，1944 年 5 月，頁 32-34。
- 中村哲，〈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台灣時報》，1941 年 1 月，頁 11-12。
- 立石鉄臣，〈本島人女性の服装〉，《民俗台灣》，卷 1 號 3，1941 年 3 月，頁 29-30。
- 吉見まつよ，〈婦人の褲〉，《民俗台灣》，卷 3 號 10，1943 年 10 月，頁 42-44。
- 安藤公乙，〈台北で見た婦人達〉，《台灣婦人界》，1938 年 11 月號，頁 34-36。
- 李英，〈点心〉，《民俗台灣》，卷 3 號 9，1943 年 9 月，頁 20。
- 周金波，〈志願兵〉，原載《文藝台灣》卷 2 號 6，1941 年 9 月，頁 8-21。收錄於河原功、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台湾人作家作品集》，卷 5，綠蔭書房，1999，頁 337-350。
- 宮田弥太郎，〈春と長衫〉，《民俗台灣》，卷 2 期 2，1942 年 1 月，頁 36-37。
- 張文環，〈芸姐の家〉，《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 年 5 月。收錄於河原功、

- 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台湾人作家作品集》，卷 4，東京：綠蔭書房，1999，頁 107-147。
- 楊千鶴，〈長衫〉，《民俗台灣》，卷 2 期 4，1942 年 4 月，頁 24-26。
- 瑞光，〈乱彈〉，《民俗台灣》，卷 1 期 2，1941 年 8 月，頁 26-27。
- 編輯部，〈皇民奉公会主催「生活科学展」に拾ふ〉，《民俗台灣》，卷 2 號 12，1942 年 12 月，頁 36-37。
- 徳永秀夫，〈本島婦人服の改善に就いて〉，《台灣時報》，1940 年 1 月，頁 40。
- 続或少女の日記抄，〈乱彈〉，《民俗台灣》，卷 2 號 1，1942 年 1 月，頁 30-31。
- 黄氏鳳姿，〈本島婦人の服飾〉，《民俗台灣》，卷 3 號 10，1943 年 10 月，頁 30-33。

Qipao, Dresses, and *Monpe*: Taiwanese Women's Clothing during the War Period

Yurn Hu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scourse on Taiwanese women's clothing from 1930 to 1945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war on gender issues under conditions of colonization. As the intensity of the war increased, more and more Taiwan males were forced to join the military.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was very similar to that in Japan itself. Therefore, enhancing control of the home front, especially the mobilization of women, became a top priority of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In fact,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attention to Taiwanese women's clothi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initial stages of Japan's colonization of Taiwan. In the war period, the question returned. Issue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alled national costume and how to modify women's cloth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war period aroused heated debate in domestic Japan as well. However, since the colonial society was mainly composed of Taiwanese, the issue of clothing was even more complicated in Taiwa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alternation, in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of qipao, dresses and *monpe* in Taiwanese women's fashions from the late 1930s can best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lonial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Wearing qipao did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aiwanese women were displaying an anti-Japanese spirit, while wearing kimonos did not necessarily signify affection for

Japan. As a means of women's self-expression, modern cultur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even into the war period. In the name of war needs,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violently intervened in women's clothing issues. However, women also continued to search for their true identities throughout the war period.

Key Words: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lothing, qipao, kimono, *monpe*, war